

## 简评《怎样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航向》

王克强同志的新著《怎样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航向》(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以下简称《航向》)为方法学、书评学和编辑学开拓了新的境界:提出“大知识工程”这一全新的概念,并以此为依托勾画出了一“整体化路线”和“整体化文库”为主体的新科学景观。这一重大新构想,不仅可能改变知识体系的总体结构;而且已产生了一系列实际效益:如为当代中国争得‘生物计算机的理论预言的优先权’、提出一系列富有预见性的实用理论工具和理论框架的实验性实例,等等。基于对《航向》这部气度非凡的新构想,及其所初步展现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激励,愿推荐这部析义迭新、思绪横流、将科学引向深处的著作。

《航向》既是一部书评学和编辑学的专著,更是一部方法学专著。它不仅成功地发掘、揭示出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之方法论奥秘,将其移植于若干个学科,进行了一系列合乎逻辑的纵横发挥,导致了一系列成效卓著的科学成果的‘链锁反应式’的产生;而且对于坚持、运用和发展丰富唯物辩证法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列宁曾说:“要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事业,就应当辩证地研究人类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航向》的作者正是通过对世界史、哲学史、科学史、技术史、经济学、数学、化学、物理学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史等诸方面的大量研究,提出了具有深刻辩证法思想的新的书评学理论框架:“以三个方向一致”(科研方向、选题方向、科学发展方向),“二种评价标准”(有中国特色的图书衡量标准和图书评价标准),“一条研究路线”(集合研究路线)等基本论点为主干的书评学理论框架的系统选题的方法论框架。这框架富有深刻地辩证性、独创性、启迪性和实践性。它不仅为著书人、编书人、卖书人、藏书人、评书人、读书人从书海中找到自己的选题方向;进而为有计划地、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所追求的出版物或出版选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背景参考系。而且也如何正确地运用和丰富唯物辩证法,提供了新的科学启迪和生动示范。比如,《航向》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当代科学思想的发展趋势,揭示“三种方向”的内在一致性的同时,还指出:依据一系列当代中国学者著作中的共同“深层结构”看,实质上已构成一条具有时代性(纵通古今,横贯百科)、民族性(兼容并蓄,自强不息)和世界性(选题与现代科学趋势一致)的科学研究路线——“集合研究路线”或“整体化路线”。这条研究路线的提出和论证,是创立“大知识工程”的新思想、新见解。在方法上深刻地体现了作者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辩证思维方法建构理论体系的范例。我们知道,用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对象的形态与结构,要透过各属性、成份、因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对象的发展历史,也要透过各属性、成份、因素在产生时间上的前后相继看到它们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看到历史过程的本质。对象的结构、形态和对象的历史的一致正是表现为这种本质的一致。在深刻认识对象结构和历史的本质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概念、判断、推理,并通过这些概念、判断、推理的彼此结合、排列、结构,反映对象的发展历史。在《航向》中,著者对此方法原则的运用是多方面的和成功的。如著者在研究了门捷列夫周期表之后,认识其方法论奥秘,是发现“系统”及其“整体性”的实用理论工具。元素周期表系统地反映(或预测)每一种元素的性质、位置,及其深刻的逻辑原因和历

史原因。并从门捷列夫周期系方法的角度提出：一个科学的目录系统，实质上包含着一个反映图书体系（和知识系统）的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的选题系统和概念系统，它具有以“书名评价书名”，以“选题预测选题”的科学功能。又如，《航向》中对光学、进化论、经济学、航天学、新闻学、逻辑学等诸学科的基本概念的共同“深层结构”的分析、比较和研究以及所得出的论断和设想，不仅直接地体现着作者对唯物辩证法的逻辑和历史相结合方法的正确应用，而且更启迪着人们应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其次，《航向》的实践意义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广泛性是很深刻的。它对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反对“全盘西化”；加强民族传统教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都有很重大意义。因为《航向》的写作和出版的基点，是建立在作者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忧心和对图书的社会功能现实情况的分析研究之上的。作者在《航向》的“导言”中严肃而尖锐的指出：“千百年来，在人们思想中，‘书’和‘读书’似乎一直是与‘美好’和‘进步’直接联系着的。然而，现在已有愈来愈多的事实说明：正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样，书可提高人的素质，亦可毁人的前途，书可推动社会进步，亦可造成重大社会问题。”作者还以愤慨和批判的语气写道：在人们抱怨“卖好书难、出好书难……买好书难”的同时，“格调低下、庸俗书刊在拜金主义的推动下，甚嚣尘上，屡禁不绝，涉及社会各个角落”。“大量沿着淫秽读物展现的色情、凶杀等邪路走向深渊的沉沦者，从反面告诫人们：‘一颗子弹只能打死一人，一本坏书却能腐蚀一大片’。”“坏书不仅抢占了好书的纸张和市场等等，更夺走了好书的读者及其时间和思想，损害了他们为社会作贡献的意志和才华”。为此，“绝不能让‘好书难出门、坏书传千里’的势态在当代中国存在和蔓延，使之成为我们实现‘四化’，再展宏图的心腹之患”。由此也说明了，一个能为社会实践需求和读者所欢迎的新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框架的提出和阐述，是同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紧紧相连的。

《航向》关于“编著有中国特色出版物的几个问题”、特别是关于“从若干侧面，看当前图书文献中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和当代科学实践运动发展的基本趋势”问题的分析、批判和阐明，对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鼓吹“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既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政治需要和特点，也是他们对当代科学文化运动发展趋势无知的大暴露。这正如《航向》中批判和说明的情况：“大量事实说明：‘厚西薄东’和‘谈今忘古’这两种似乎是对立的错误倾向，实质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当前出版物中的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是：过份崇拜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忽视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古代科学文化，而当代科学实践运动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则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和东方古代科学文化大交叉、大汇流”。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要“及时发现、并以科学文化及其发展过程的整体性为背景参考系去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中国就有可能首先发现、研究这个科学文化空前大汇流中一系列交叉点和交叉面上涌现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并在此基础上编出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物。

总之，《航向》不仅在编辑学、书评学和方法学上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提出了十分可贵的深刻启迪和重大课题。这都是可贵之处。但《航向》中的新概念、新选题、新构想如潮水般的奔涌而来，而受到有限篇幅的制约，既无法一一阐明，又难以作严谨而全面地论证和阐述。因此，空疏乏力，令人费解者有之。凡此种种，有待作者今后在进一步拓展上列思路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与完善。（朱传燊）